

每逢进入腊月，年味就渐渐浓了。贾府也是如此。这一天，王夫人命凤姐置办年货。那一边，贾珍打开宗祠，着人打扫，收拾供器，“又打扫上房，以备悬遗真像”。忙乱之间，贾蓉捧着一个黄布口袋进来。贾珍见那黄布口袋上印有“皇恩永锡”四个大字与吏部祠祭司的印记，又写着一行小字：“宁国公贾演，荣国公贾源，恩赐永远春祭赏共二份，净折银若干两，某年月日龙禁尉候补侍卫贾蓉当堂领讫。”下面是一个朱笔画押。贾珍于是带着贾蓉来到荣府，回过贾母、王夫人、贾赦与邢夫人，再回到宁府，取出银子，“将口袋向宗祠内大炉内焚了”。之后，拟定请吃年酒的日期单子，去大厅看“小厮们抬围屏、抹几案、金银供器”，这时一个小厮手里拿着禀帖，并一篇账目，回说：“黑山村的庄户头来了。”贾珍展开单子，只见上面写着：

大鹿三十只，獐子五十只，狍子五十只，暹猪二十个，汤猪二十个，龙猪二十个，野猪二十个，家腊猪二十个，野羊二十个，青羊二十个，家汤羊二十个，家风羊二十个，鲜鲤鱼二百个，各色杂鱼二百斤，活鸡、鸭、鹅各二百只，凤鸡、鸭、鹅二百只，野鸡、兔子各二百对，熊掌二十对，鹿筋二十斤，海参五十斤，鹿舌五十条，牛舌五十条，蛎干二十斤，榛、松、桃、杏、枣各二口袋，大对虾五十斤，干虾二十斤，银鱼五十斤，中等二斤，柴炭三万斤，御田胭脂米二石，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糯五十斛，各色干菜一车，外卖菜谷，牲口各项之银共折银二千五百两。

看过单子，贾珍很不满意，对乌进孝说：“你这老货又来打擂台来了……我算定了，你至少也有5000两银子来，这够作什么的？如今你们一共只剩了八九个庄子，今年倒有两处报了旱涝，你又打擂台，真真是又教别过年了。”乌进孝解释，九月里一场碗大的雹子，打伤了庄稼，连人带牲口也打伤了不少，“爷的这地方还算好呢！我兄弟离我那



贾府的地租与岁俸

□王彬

里只100多里，谁知竟大差了。他现管着那府里八处庄子，比爷这边多着几倍，今年也只这些东西，不过多二三千两银子，也是有饥荒打呢。”

根据乌进孝提供的单子，一部分是大鹿、鸡、鱼、柴炭、胭脂米、碧糯米等实物地租；一类是外委的梁谷、牲口各项折银2500两。大鹿等实物折合多少银两，这里不算，只算那1000石米，乾隆十六至十八年每石米为一两二钱，1000石则约为1001两白银。

分析贾珍与乌进孝的对话，宁府有八九处庄子，每处庄子每年至少有5000两银子，但今年的黑山村却只有2500两，让贾珍很不高兴。对此，乌进孝的解释是，相对荣府，宁府已经好多了，让贾珍知足吧！依据贾珍的计算，正常年景，一处庄子不算实物，至少应交5000两银子，8处便是4万两，荣府也应如此，两府相加是8万两。但这只是贾珍的理论，实际则要大打折扣。比如，今年，荣府的8处庄子统共也只有5000两上下，难怪凤姐“要偷出老太太的东西去当银子呢”。

除地租外，贾府还有一笔进项，即：男性的岁俸。根据乾隆十九年(1754年)钦定的《大清会典·户部俸例》：“亲王岁支俸银万两，世子6000两，郡王5000两，长子3000两，贝勒2500两，贝子千300两，镇国公700两，辅国公500两，一等镇国将军至奉恩将军，凡十有三等，禄自410两每降一等，减25两，宗

室室骑尉85两，授云骑尉品级者80两。”又规定“禄米自王公至文武官弁均以俸定数，每俸银一两支米一斛”。以亲王为例子，每年的俸禄是1万两白银和1万斛大米。以此类推，一等镇国将军岁俸是：银410两，米410斛；二等镇国将军是：银385两，米385斛；三等镇国将军是：银360两，米360斛；一等辅国将军兼一云骑尉是：银335两，米335斛；一等辅国将军是：银310两，米310斛；二等辅国将军是：银285两，米285斛；三等辅国将军是：银260两，米260斛；一等奉国将军兼一云骑尉是：银235两，米235斛；一等奉国将军是：银210两，米210斛；二等奉国将军是：银185两，米185斛；三等奉国将军是：银160两，米160斛。在红楼人物的谱系里，贾赦是一等将军，贾珍是三品爵威烈将军，他们应该对应哪个系列的将军呢？这当然只能假设。假设他们都属于最高级别的镇国将军系列，则贾赦的岁俸是：410两白银，410斛大米。贾珍是：360两白银，360斛大米。在清代，一石等于两斛，如果折合白银，则410斛大米折银为205两401钱，360斛大米折银为180两360钱。二者相加而取其整数，贾赦是615两，贾珍是540两。

那么，贾赦的兄弟贾政，他的岁俸是多少？在贾府被抄家之前，贾政没有爵位，而是在工部任职，先是做主事，后来擢为员外郎，到了第九十三回，当年京察，“工部将贾政保列一等”，而“放了江西粮道”。工部主

事是正六品，员外郎是从五品。那么，江西粮道呢？这就牵涉到道员的出身。在清代，由京堂(在京之寺、卿)等官补授道员者，为参政衔，秩从三品；由掌印给事中、知府补授者，系副使，秩正四品；由各部郎中、员外郎、主事或同知补授者，系签事，秩正五品。贾政从员外郎外放江西粮道，应该是正五品。六品、从五品、正五品的岁俸禄是多少呢？《大清会典·户部俸例》规定：“在京文职八旗武职，一品官180两，二品百55两，三品130两，四品105两，五品官80两，六品官60两，七品45两，八品40两，均正从同禄。九品33两，从九品31两，各有奇。未入流与从三品同。笔帖式七品33两，八品28两，九品21两，文职于正俸外增加一倍，曰恩俸。又，从一品至九品，月给银5两至1两有差口公费。”禄米也是“每俸银一两支米一斛”。据此可知，贾政做工部主事时岁俸是60两，恩俸也是60两，公费以2两计算，60斛米折银3两60钱，总计152两60钱。做员外郎时，岁俸80两，恩俸80两，公费以2两500钱计算，80斛米折银4两80钱，则为102两588钱。至于江西粮道，其正俸与京官同，只是恩俸转变为养廉银，姑且以10倍计算则为800两，这样贾政任江西粮道期间的岁俸应为902两588钱。但是，贾政在这个位置上，由于属下贪渎而受到牵累很快离职，因此这部分岁俸，可以不计，仍以其任职最久的员外郎岁俸计算，这样贾赦、贾政、贾珍三人的岁俸取其整数，应为1221两；而地租，不算实物地租，只计算上交的银两，正常年景应是8万两白银，与贾赦等人俸银相加总计81221两白银，现在可折合人民币14721306.25元。

贾府的地租与岁俸大抵如此。

※2013年3月10日和讯白K线，每克白银的买入价是人民币5.79元，卖出价是5.81元，折中为5.8元，以此为准进行兑换，旧制一两折合31.25克。

《中国文脉》以何为脉？

□孙青瑜

曾在杂志上读到余秋雨先生的《中国文脉》，时隔近一年，很多内容都忘了，可他下笔“胸有成竹”的气势却记忆犹新，句句皆是摆史式的定论，相信让很多没有国学基础的读者读了不得不作醍醐灌顶状。

可事实上《中国文脉》真的是中国文脉吗？

我觉得为中国定“文脉”是一个极为浩瀚的工程，绝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工作，因为它代表的是一个时代对历史文化的重新认识和定位，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的声音和审美趣味。比如历史上每一次整编文化的工作都是一帮人在参与，一是工程浩荡，二是可以纠正个人的感性因子。如唐朝以孔颖达为首的《五经正义》的编订工作，人数多达一个部门；清朝以纪晓岚为首的《四库全书》的编订工作参与人数更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而参编人员呢？最起码要对史文哲三脉文化做过精透的研究，才有可能有机会入内参与。当然，也有很多国学大师写史，但他们写的大都属“一枝”之史，不是哲学史，便是美学史，不是美学史，便是断代史、书画史或文学理论史……皆不敢涉及“中国文脉”这个博大无边的大问题。

在《中国文脉》一文中，作者想借巧力化乾坤，用文学艺术的形式为文化立史，不是不可以，但是这种代表个人声音的文化史，也要求作者对文哲史有“以一贯之”的深厚内功，学术研磨不但要深广，还得有打通各脉文化的能力。可是看完《中国文脉》，发现作者一直在用他才子型的感性目光，企图穿透中国文化这口深不见底、浩如烟海的文化海洋，而事实上，他的学术视野没有走出文学的和感性的局面。

文化和文学一字之差，却是主杆和分杈的大别。

比如文中在谈及道家文脉时，将庄子的贡献定在老子之上，便是凭着感性认识想当然的结果。我认为如果余秋雨先生真的站在整个文化的大框架下，应该不会如此草率地将“老庄”改写成“庄老”。老子和庄子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以及对中华民族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的贡献和影响力，简直有点难分伯仲。可事实上还是能分伯仲的，古人定的“老庄”顺序并非单的时间序列，因为《庄子》只是从方法论上延续并细化了《老子》一书中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庄子以寓言为主的方法论，本来是为了更清楚地阐明没法用语言直说的本体“道”，不想却无心插柳成荫，他以事象为中转站的论述方式和思维方式对中国美学、中国文艺，甚至语言哲学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力。用大白话说就是老子对中国美学、中国文艺起的是引领大方向的作用，就像是制定方针政策的人，而具体的执行人不是他，而是庄子。庄子从言义关系论道时，借用事象这个中转站曲线论道，恰恰给中国美学和中国文艺留下了很多具有实战经验的方法论。但是，系统地磨研了中国哲学史就会发现，在哲学领域庄子的影响力却不及老子。也就是说，庄子和老子的贡献不属于同一领域。但从老子来说，他们又在一个领域，因为无论是讲美学、文论、诗学、书画、存在学……凡讲庄子，必得先说老子，而讲老子时，却不一定就要说庄子，这就是老子和庄子的区别，这就是“老庄”叫了几千年的理由和原因。可是余秋雨先生却在《中国文脉》中将庄子定在老子之上，显然不是立足于文化史，而是立足于中国文艺理论史。而事实上他在文中为老庄定文化地位时，并没有说出过这个原因。好像历代大师是他手中的棋子，或面南称文王，或朝北称文臣，全在作者的“一念之微”，没有原因，只有定论和结果。

如果说《中国文脉》是文学之脉，如果说作者是以文论家的审美眼光为古人定伯仲，那他在给曹丕曹植两兄弟定高低时，又把曹植定在曹丕之上，这着实又很让人费解。因为研磨过中国文论的人都知道，曹丕写了一篇对中国文论发展史影响很大的《典论》，除此之外，曹丕还让“气”的概念进入了文学，并从哲学元气里独立而出，与庄子之气一道，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概念：气象。这是何等大功！

固然曹植的诗很好，很有才，可他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还构不成改天换地的影响。换句不敬的话说，没有曹植，中国文学史没有太大变化；可是没有曹丕，中国的文论史就得改写，中国的文学史也得改写。《中国文脉》一文，不是站在整体文化框架之上鸟瞰文化，不是站在文学史的框架下仰视文化，而是站在中国诗学的一隅在“感觉”中国文化，貌似文脉，其实成了诗脉。每一个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感性认识为诗人和小说家排名列位，但是以“中国文脉”为题目虽然漂亮，可惜太大了。



程多耀油画作品

尽量不打搅别人

□陈世旭

出差路过某城市，到达时将近傍晚，有好几个小时等待转车。同行的同事说，我在这里有个好哥们儿，让他请我们吃晚饭。我问事先告诉人家没有，否则很唐突。同事说，你放心，凭我和他的关系，只怕他高兴还来不及。电话讲了很长时间，同事的脸色越来越不好。最后他说，不要我请你，你再忙总要吃晚饭的嘛。结束电话，同事骂了一句粗话。

后来的旅途上一直是我在劝这位同事：也许人家真的忙得走不开；也许有更重要的聚会不便推辞；也许什么事也没有，就是没有心情。毕竟，每个人的私人空间都有自己做主的绝对自由，任何冒昧的“闯入”和“占有”都不能说是天经地义的。你的朋友有拒绝的权利，并没有必须接受的义务。何况人家“忙”，无论真忙还是假忙，都已经给了你台阶，很礼貌了。

为了和同事真正放下这次不愉快，我又把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五儿子王子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故事做了另一种解读给他逗闷子：王子敬某夜一觉醒来，看到大雪纷飞，一片洁白，吟咏起左思的《招隐诗》，忽然想起了画家、音乐家戴安道。当即起程上船，连夜去拜访远在刻县的戴安道。

船冒着风雪行了一夜，到了戴安道家门前，他却又让船掉头返回。问他这是干吗呢，他说：我是乘着兴致来的，兴致没了自然返回，为什么一定要见人呢？

魏晋人物往往神神道道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里记录的这个故事，人们耳熟能详，表现的自然是王子敬率性任情的名士风度。但我以为，似乎也不能排除不想让朋友笑他轻狂的考虑，再说折腾了这一夜也该消停了。同事听了，扑哧一笑。

我讲这个故事的真正意思是想说，对真正的好朋友来说，见不见面并不重要。好朋友并不是拿来应酬的，重要的是在你人生要紧的时刻，他的情感和心灵是不是跟你在一起。至于一般意义的朋友就更不应该随意打扰。除非自己渴望见到的人，一个人正一心一意忙着自己的事，忽然被人突如其来地打扰，的确是很不爽的事。生活中我们自己也并不缺乏这样的经验。比较恰当的做法是事先打个试探性的电话，得到积极反应才说出自己的行止和意图。如果对方不便，自己也有转圜的余地。

偶尔看到一则关于酒店员工的手册，把“不要在出洗手间时当众系裤

带”和“不随意打搅和干扰别人”连在一块说，可见二者性质的相近。有人甚至专门设计出了既不想受别人打搅又不想关机而使自己的手机号码变成空号的办法。可见免受不想得罪的人的打扰成了现代心理的一种。

因此，不随便打扰别人，尤其是不要随便打扰不想开罪你的朋友，就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必修课。在这方面我是有深刻教训的。有一次得到一位我很敬仰的作家的赠书，受宠若惊，竟至于忘乎所以，觉得书里作家自己画的插图不错，想也没想就去信，要拿自己的字交换对方的画。对方回信，只说眼下没有画画的想，至于“交换”则一字没提，很婉转很礼貌地给了回绝。我马上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可笑：别人干吗要给你画画，干吗要跟你交换？这些都没想好就冒失要求，那就只能是一种无理打扰。

小孩读的《弟子规》就有“人不同，勿事搅”，人家正在休息或做事还去麻烦，人家门上明明挂了“请勿打扰”还使劲敲门，人家已经说了无数遍“好的”还不肯挂电话……之类，都是不得体的。与人交往时，还是应该懂得察言观色，不能只想到自己而不顾及别人。那样最终受伤害的一定还会包括自己。

间谍(特工，或称秘密工作者)古已有之，《孙子》十三篇的最后一篇就是《用间》；到三国时代间谍活动更有进一步的发展，手段五花八门，有许多著名的故事。



玄览堂笔记

人们耳熟能详津津乐道的三国特工有两位：男的蒋干，女的貂蝉。

蒋干盗书乃是最一般的窃取情报。据《三国志演义》第四十五回《三江口曹操折兵 群英会蒋干中计》的描写，蒋干本来是奉曹操之命以老同学的身份到周瑜那里去当说客的，游说不成他就顺手偷了一份情报，而弄来的所谓秘密文件却是周瑜专门为他准备的，结果让自己的主公中了对方的反间计。弄巧成拙，有苦说不出。这样蒋干就成了一个著名的喜剧人物，在舞台上须由丑角来扮演。这个蒋干无非是一名自作聪明的业余间谍，水平低下倒也难怪。

不过这个著名的故事乃是小说家的创作，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历史上蒋干并无盗书之事，说客是当过的，虽然没有成功，但他仍然是一个正面的形象。真正的蒋干不仅仪容容有才辩，而且识得大体，一旦发现对方决非游说可以动摇者，就一言不发，只是笑笑，知其不可而不为，很快回去复命；虽然没有完成主公交代的使命，但名士声誉如故，智商亦毫发无损。这同小说戏剧里那个小丑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顺手牵羊窃取假情报的故事很好玩，小说作者的想象力和叙事技巧很值得佩服。蒋干这个形象给读者和观众印象甚深，而历史上那个真正的蒋干则早已被人忘却了。这就是文学作品的力量。

事实上三国时代确有真正的间谍，其故事亦曲折有韵味，只是人们不大关心。试举两个例子来看。

孙吴方面著名的间谍周鲂原为孙权手下的鄱阳太守，他假装背叛孙权投靠曹魏，自愿提供情报，并称双方打起仗来以后，将主动充当曹魏的内应。黄武七年(228年，亦即曹魏方面的明帝太和二年)，他向魏方大将曹休提供7条精心编造的假情报，核心内容是说吴方中心城市之一的武昌防空虚，建议曹休举兵来袭，自己则里应外合，共建奇功。曹休大喜，“帅步骑十万，辎重满道，径来入皖”，结果一头栽进周鲂与东吴大将陆逊安排好的口袋里；等到他发现中计之后，又自恃兵多硬着头皮打到底，结果几乎全军覆没。曹休本人侥幸逃出，不久疽发于背而死。周鲂立了大功，晋升为裨将军，赐爵关内侯。孙权为他举行盛大的庆功酒会，兴奋地说：“君之功名，当书之竹帛”(《三国志·吴书·周鲂传》)。

曹魏方面吃了大亏以后，也打起了间谍战。太和四年(230年，亦即孙吴方面的黄龙二年)，魏明帝派遣一个名叫隐蕃的高级战略间谍入吴。隐蕃是青州(今属山东省)人，只有22岁，却是一位天才的特工，他假装背叛曹魏，来为孙吴效力。由于他应对机敏，才华四溢，很得赏识，当朝大臣左将军朱据、廷尉郝普尤其看好他，以为其人有望佐之才；隐蕃利用有利形势，根据出发前魏明帝的指示，“求作廷尉职，重案大臣以离间之”，昏头昏脑的孙权本人也很器重他，就安排他当了廷尉监。

这位顺利得手的高级间谍走马上任以后，“众人以(朱)据、(郝)普与(隐)蕃亲善，常车马云集，宾客盈堂”(《三国志·吴书·胡综传》注引《吴录》)。当时只有侍中胡综保持着比较高的警惕，反对给予高位，主张对此人进一步加以考察，谨防上当。这时候没有人肯听他的。

隐蕃打孙吴上层以后不久，不幸暴露了自己特务的身份，他迅即逃走，但还是被抓住了，遭到严刑拷打，始终不屈，没有任何口供，很有高级间谍的风骨。但他的种种活动也还没有来得及给孙吴方面带来多大的损害。处死隐蕃以后，孙权本人当然不会承担什么责任，只是严厉地责备廷尉郝普，郝普自杀；又处分左将军朱据，将他软禁了一段时间。大有先见之明的胡综则得到升迁。

胡综不仅是一位反间谍的行家，他自己在秘密战线上也曾主动出击，颇有成效。在隐蕃事件的前不久，当他了解到曹魏方面镇守河北的振威将军吴质受到中枢的猜疑时，别出心裁地用吴质的名义写了一份向孙吴方面投降的信，又故意将此信散布出去，结果曹魏方面很快解除了吴质的兵权。吴方没有费什么大事就把对方的部署打乱了。吴质既是元老级高官又是著名的老作家，而胡综模仿他的文字风格几可乱真，表现了很高的水平。长期以来以孙权名义发布的若干重要文件也出于他的手笔，我在一本旧著中曾将胡综作为孙吴方面的知名作家之一略有论列(《建安文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63页)，或可参看。

在当时的三分天下中，军事实力当然是曹魏最强，而单就间谍战这一端而言，则孙吴方面明显胜出一筹。所以《三国志演义》写周瑜借蒋干来游说的机会巧施反间计并取得辉煌的战果，虽然是出于艺术虚构，倒也符合当时间谍战南强北弱的大趋势，自有其“通性之真实”。

至于著名的美女间谍貂蝉则完全是小说家的创造，在史籍中毫无凭借；而后来竟然同西施、王昭君等历史人物并列于几大美女之一。据《三国志演义》第八回《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董太师大闹凤仪亭》及其稍后的描写，貂蝉原是司徒王允府中的歌伎，年方二八，“色伎俱佳”，(王)允以亲女待之”。下决心除掉奸董卓的王允安排下一道妙计：先将貂蝉许配给猛将吕布为妾，然后又献给董卓，人为地制造了一个三角恋，焦点人物貂蝉在其中作出了非凡的表演。于是怒火中烧的董卓将貂蝉的干儿子吕布布作起来，在董卓入朝时突然将其刺死。小说中这一相火暴热闹的场景完全出于艺术创造。历史记载中只是说王允“乃潜结(董)卓将吕布，使为内应。卓入朝，吕布因刺杀之”(《后汉书·王允列传》)；《后汉书·董卓列传》比较详细地写到了这一事件的细节，也根本没有提到有什么美女间谍貂蝉在其中发挥作用；成书在前的《三国志·魏书·董卓传》也是(吕)布为骑都尉，甚爱妾之，誓为父子，而“卓常使布守中阁，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中不安”。小说作者大约从这个偷情的侍婢身上获得灵感，竟渲染出一大段锦绣文章来。

所以，人们在谈到三国时代的间谍时，真正干特工的隐蕃、周鲂、胡综等大抵不甚为人所知，倒是小丑蒋干和美女貂蝉大放光彩。小说往往要比历史书影响大得多，而美女间谍即是虚构出来的，也很容易名扬天下——读者反应和社会心理往往如此。《三国志演义》不愧经典之作，其中值得揣摩研究的地方很多，两位间谍盖仅其小焉者耳。